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治理效应研究

谢乔昕

(浙江财经大学,杭州 310018)

内容提要:随着税收征管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如何实现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与企业创新驱动发展之间的协同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2008年—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经验数据,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事件考察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地提升了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在传统行业企业、位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技术型高管任职企业以及弱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的影响主要通过避税行为、代理成本和可支配现金流渠道传递。本文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税收征管改革的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 金税三期 创新注意力 治理效应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544(2024)04-0061-14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消退,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创新将在增进企业竞争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中扮演愈发

重要的角色。企业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力军和关键力量。已有研究发现,创新活动受到企业注意力配置的显著影响(吴建祖等,2016)。由于注意力资源的稀缺性,管理者往往会将注意力更多地投放到企业最重要的战略决策领域。经验研究表明,管理者对创新领域的注意力配置与企业外部创新机遇捕捉、内部资源配置偏向以及组织文化塑造等多方面密切相关,对创新活动开展以及创新质量提升

[收稿日期]2023-07-25

[作者简介]谢乔昕,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党的二十大和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精神研究阐释”专项课题“逆境事件冲击下数字化赋能制造企业创新韧性的效应、机制及提升策略研究”(37)。

具有显著影响(陈守明、唐滨琪,2012;宋广蕊等,2022;解学梅、韩宇航,2022)。因此,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强化管理层创新注意力就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意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

税收制度是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外部环境。除税率、税收优惠等规定外,作为税收制度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征管通过影响企业逃避税行为,决定企业实际税收负担,对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直接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采用以“人管人”为主的经验管理模式进行查税和征税。这种征管模式赋予了税务征管人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存在数据来源单一、征收过程规范性不足、交易成本较高等诸多问题(蔡伟贤、李炳财,2021)。在此背景下,国务院积极尝试将信息化技术手段嵌入税收征管工作,并命名为“金税工程”。迄今为止,“金税工程”历经金税一期、金税二期和金税三期。相较于前两期,金税三期充分利用大数据信息处理优势,建立了统一的、覆盖全部税种和所有工作环节的全国性税收信息系统,实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税收征管的深度融合,有力推进了税收征管的数字化建设(李增福等,2021;Xiao and shao,2020)。

已有文献证实,税收征管数字化除了有效遏制企业逃税避税行为,提升企业税收遵从度(李艳等,2020)之外,在盈余管理、薪酬契约、关联交易等多领域具有显著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减少缓解融资约束(蔡昌等,2021)、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徐捍军,2021)、减少企业关联交易(刘慧龙等,2022)、提高企业审计费用等(李增福、朱进,2022)。与此

同时,少数研究发现税收征管能力的强化对企业实业发展具有一定负面效应,例如降低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扩张速度,提升企业生存风险等(张克中等,2020)。然而,鲜有文献探究税收征管在企业注意力配置特别是创新注意力配置方面的治理效应。鉴于此,本文利用“金税三期”实施构造准自然实验场景,深入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上市公司创新注意力配置的影响并探究其内在作用机制。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税收征管现代化双重背景下,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创新注意力配置视角,拓展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微观治理效应的相关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盈余管理、审计收费、内部薪酬差距等角度考察税收征管的微观治理效应,但对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于企业注意力配置的影响尚不明晰。而且与研发投入、专利申请等传统企业创新测度工具相比,创新注意力配置能够更好地刻画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更准确地评估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的治理作用。第二,从税收征管维度拓展了企业注意力配置影响因素相关研究。现有注意力配置研究聚焦于企业注意力配置的经济后果,即探究注意力配置在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吴建祖、关斌,2013)、国际化战略(董临萍、宋渊洋,2017)、创新活动(Zheng等,2016)等方面的重要影响,鲜有关注制度政策环境与企业注意力配置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从税收征管数字化入手考察企业创新注意力配置的前因,由税收制度视角丰富和拓展企业注意力配置的研究链条。第三,借助金

税三期工程实施这一外生事件冲击,能够较好地克服企业税收负担与创新活动关系实证研究中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提升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注意力(Attention)”概念最早由Simon(1947)提出,他将注意力界定为个体选择性关注某些信息而忽略其他部分的过程,并提出决策的关键在于决策者如何更好地配置其有限的注意力。注意力基础观认为,企业行动是企业注意力配置的结果。注意力配置在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结构、战略行动倾向等方面具有重要的解释力。Levy(2005)基于美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企业注意力模式显著影响企业全球战略定位和绩效。吴建祖和赵迎(2012)研究发现,将较多注意力配置在顾客上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多元化战略,而将较多注意力配置在竞争者则会削弱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的可能性。具体到创新注意力领域,既有经验研究发现,企业对创新领域注意力配置的提升有助于企业更好地识别环境中的创新机会,并投入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些机会。例如,Yadav等(2007)发现,企业对创新注意力的配置显著影响创新活动强度。Eggers和Kaplan(2009)发现,企业对新兴技术的关注将加快企业进入新市场的步伐,而对现有技术的聚焦则会阻碍企业进入新市场的节奏。汪涛等(2020)研究表明,高财务松弛水平使企业管理者能够更多地将注意力投向创新活动,增强内部研发与外部合作两类创新模式之间的协同互补。

外部环境是影响企业注意力配置的重要因素,而注意力配置是联结外部环境与企业行动的桥梁。在日常经营决策中,管理层需要在研发、销售、生产等多领域配置注意力资源。在配置结构上,管理层通常不会在各领域均匀配置其注意力资源,而是将精力更多聚焦于当前对企业竞争优势塑造和财富创造影响重大的战略决策领域。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不同战略决策在企业竞争优势构造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带来管理层注意力配置结构的转换。具体而言,税收征管数字化改革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改变“创新—避税”行为报酬结构,抑制企业对避税活动的注意力配置,促进创新注意力的提升。出于减少税收成本及节约现金流的考虑,避税行为在企业中广泛存在,是企业管理层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关注的重要领域之一。然而,税收规避活动往往涉及大量复杂的交易活动以及对现行税制条款的反复研读,需要耗费管理层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宽松的税收征管环境下,企业存在较大的避税空间,具备较强的避税动机。管理层对税收规避活动过多的配置会对创新注意力资源形成挤占。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高效的信息协同和整合,显著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被识别和惩戒的概率,极大地压缩了企业利用关联交易等方式规避税收的行动空间,抑制企业管理者对避税活动的注意力配置。同时,在传统税收征管体系下,税收征管机构和人员掌握较大自由裁量权,为管理者寻租行为和讨价还价行为提供

了一定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对创新领域的注意力配置。税收征管数字化改变了以往“人管人”经验征收模式,通过省局、总局纳税信息集中处理,减少了企业与基层税收征管机构和征管人员之间的寻租和讨价还价的空间(孙雪娇等,2021),促使企业注意力由避税向生产性活动领域转移,强化创新注意力配置。

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促进企业创新注意力的提升。Balakrishnan等(2019)发现,企业税务筹划活动增加了企业经营结构和财务的复杂性,导致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分析师预测误差的增加,降低了企业盈余质量。Desai等(2006)研究发现,企业避税活动降低了财务信息透明度,增加了外部股东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成本和难度,进而导致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增加。另外,以增进企业价值为名开展的避税活动使管理者能够辩称财务信息透明度的降低是必要的,使管理者能够在避税目标的掩护下利用税收筹划技术谋取私人利益,加剧企业代理问题。代理问题对管理层创新注意力配置具有抑制效应。一是由于管理者面临任期业绩考核压力,而创新活动投资周期长、失败风险高等特征使管理者开展创新活动与短期业绩指标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二是创新活动较高的专业技术含量使投资者难以识别和评估管理者的能力及努力程度,一旦创新项目失败,投资者难以判断是否应将其归咎于项目本身的难度还是管理者个人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容易遭到利益相关方的苛责并承担个人薪酬、声誉等方面的损失,进一步

阻碍了管理者对创新活动的注意力配置。“金税三期”将企业关键财务指标进行数据信息和逻辑关系比对,建立企业税务风险预警机制,能够及时锁定可疑企业,并要求其提供详细纳税材料,提高了管理者降低财务信息质量行为被稽核的风险。同时,税收征管数字化利用大数据技术集成不同数据源的数据,使税务部门能够对不同来源数据进行相互印证,获取经济活动的全景式信息,使管理者转移资产、虚构交易等代理行为更容易被捕获和限制,强化管理者代理行为的约束。代理问题的缓解将有助于遏制管理者短视主义倾向,继而提升企业管理者对创新领域的注意力投入。

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影响企业税收负担,降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水平,影响企业对创新活动的注意力配置。从企业的角度看,税收支出是国家对企业经营成果的强制性分享,是一项大额的经营成本和现金流支出。“金税三期”工程通过银行、海关等多部门间的信息共享,有效地提高政府税收稽查能力,进而压缩企业逃避税空间。税收遵从度的上升短期内导致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增加,减少企业可支配现金流,进而削弱企业内源融资能力(李增福、朱进,2022),这可能会促使企业管理层将注意力更多投向短期盈利状况及流动性风险应对,决策视野趋于短期化,一定程度上挤出企业对创新活动的关注和精力投入。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设:

H: 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注意力。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金税三期”工程自2013年率先在山西、重庆、山东三个省(市)上线运行;2014年在河南、内蒙古、广东(除深圳市)上线运行;2015年相继在宁夏、海南等14个省(区、市)上线运行;2016年覆盖全国。考虑到2007年新会计准则以及“金税三期”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跨度,本文选取2008年—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ST类企业样本、2013年以后上市的企业样本、金融业企业样本以及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共得到6971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为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及WIND数据库。

(二) 变量定义

1. 创新注意力(*Attent*)

作为一种主观观念,注意力配置难以观察和刻画。借鉴吴建祖等(2016)的做法,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测量管理层创新注意力。该方法基本假定是,个人的认知可以通过其语言表现出来,词语的出现频率反映了使用者对与之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即频率越高,使用者在该信息上配置的注意力越多。具体到企业层面,上市公司年报中“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包含了管理层对公司经营情况的回顾和展望,是管理层注意力的外化表现。本文以观测年度企业年报“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作为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原始文本分析材料。在对企业年

报阅读和分析基础上,筛选与“创新”相关的表述词汇,包括技术、研发、专利保护、知识产权等,构造关键词库。继而,借助Nvivo软件对相关关键词文本进行编码和词频计算。最后,使用关键词词频与“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部分总词数的比值作为管理层创新注意力的衡量,比值越高,管理层创新注意力越强。

2. 税收征管数字化(*GTP*)

“金税三期”大数据税收征管系统的上线实施是本文研究的解释变量。本文根据政策实施情况构建税收征管数字化虚拟变量。当企业所在省份*i*在*t*年上线“金税三期”系统,则*GTP*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Control*)

借鉴宋广蕊等(2022)的做法,本文控制了以下企业特征变量:①企业规模(*Size*),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②成长性(*Grow*),使用营业收入增长率衡量;③负债率(*Lev*),以总负债与总资产比值衡量;④盈利状况(*Roa*),使用总资产收益率衡量;⑤企业年龄(*Age*),使用样本年份减去企业注册年份加1后取自然对数衡量;⑥两职合一(*Dual*),企业董事长与总理由同一人担任,赋值为1,反之为0;⑦管理层持股(*Mhold*),使用管理层持股占企业总股本比例衡量;⑧两职合一(*Dual*),若董事长和总理由同一人担任,设为1,反之为0。此外,为控制创新注意力的地域效应、行业效应和年度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是地域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和年度虚拟变量。

(三)模型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蔡昌等,2021;刘慧龙等,2022),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影响,模型形式具体如下:

$$Attent_{i,t} = \beta_0 + \beta_1 GPT_{i,t} + \gamma Control + \tau_i + \lambda_j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1)中,Attent表示管理层创新注意力,GPT表示税收征管数字化,Control表示控制变量。 τ_i 和 λ_j 分别表示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残差项。所有回归标准误进行公司层面聚类处理。根据假设H,预期 β_1 显著大于0,即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强化了管理层创新注意力。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1列示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皮尔逊相关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创新注意力Attent均值为0.253,标准差为0.185。由于“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囊括诸多内容,创新议题只占其一小部分,因此创新注意力文本占比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金税三期工程GTP均值为0.389,实验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分布结构未见异常。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ttent	6971	0.253	0.185	0.000	1.742
GTP	6971	0.389	0.488	0.000	1.000
Size	6971	22.131	1.498	15.418	31.036
Grow	6971	0.145	0.243	-0.250	0.721
Lev	6971	42.596	19.030	11.037	75.754
Roa	6971	0.040	0.204	-9.117	22.005
Age	6971	15.736	5.914	0.000	62.000
Mhold	6971	38.381	23.340	0.000	326.730
Dual	6971	0.251	0.434	0.000	1.000

(二)基准检验

表2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估计中自变量只包含GTP、年度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及行业固定效应,第(2)列估计结果中引入了其他控制变量。由表2可知,“金税三期”工程GTP的估计系数均

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创新注意力,假设H得到支持。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有效性依赖于其能否满足平行

表2 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1)	(2)
<i>GTP</i>	0.680*** (13.517)	0.508*** (18.884)
<i>Size</i>	—	-0.024*** (-3.999)
<i>Grow</i>	—	-0.002 (-0.999)
<i>Lev</i>	—	-0.001*** (-2.746)
<i>Roa</i>	—	-0.068* (-1.901)
<i>Age</i>	—	-0.016*** (-13.741)
<i>Mhold</i>	—	-0.001*** (-4.043)
<i>Dual</i>	—	0.129*** (9.853)
截距项	4.629*** (88.165)	5.827*** (40.816)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971	6971
R ²	0.159	0.248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趋势假设。就本文而言,平行趋势假设成立要求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的创新注意力在时间趋势上是平行的。构造以下模型检验基准模型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Attent_{i,t} = \beta_0 + \sum_{n=-3}^{n=0} \beta_n Before_{n;i,t} + \gamma Control + \tau_i + \lambda_j + \varepsilon_{i,t} \quad (2)$$

$Before_n$ 表示企业所属地区开展金税三期的第n年,分别包括实施前3年虚拟事件变量、实施前2年虚拟事件变量、实施前1年虚拟事件变量以及实施当期虚拟事件变量。式(2)估计结果列示于表3和

图1。由表3可知, $Before_{-3}$ 、 $Before_{-2}$ 和 $Before_{-1}$ 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符合平行趋势假设的预期,即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创新注意力在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时间趋势未呈现显著差异。

2. 安慰剂检验

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准自然实验中,为消除某些不可观测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通过随机分配政策冲击变量*GTP*,然后用模拟样本对式(1)进行回归,过程重复500次。由于是否实施“金税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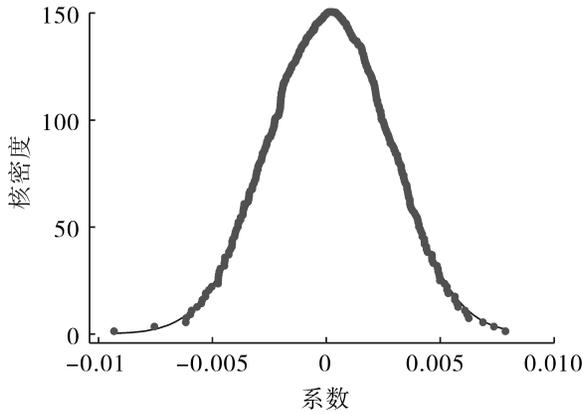


图1 安慰剂检验估计结果分布

期”工程是随机分配的,预期安慰剂检验中随机生成的 *GTP* 不会对企业创新注意力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随机分配的 *GTP* 估计系数结果列示于图1。结果现实,随机分配的 *GTP*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和显著为负的估计结果占比较低,这表明未观测到的城市特征几乎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这一结果表明本文构造的虚拟处理效应并不存在,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变化确实是由“金税三期”的实施引起的,而不是其他因素所致。

表3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估计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1)	(2)
<i>Before</i> ₋₃	-0.000 (-0.012)	0.001 (0.095)
<i>Before</i> ₋₂	-0.016 (-1.431)	-0.014 (-1.212)
<i>Before</i> ₋₁	-0.007 (-0.467)	-0.008 (-0.496)
<i>Before</i> ₀	0.037*** (2.983)	0.037*** (2.86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971	6971
R ²	0.320	0.275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3. 改变创新注意力的衡量方法

借鉴李哲(2018)的做法,使用经行业一年度中位值调整的创新注意力文本占比(*AdjAttent*)作为企业创新注意力的替代衡量,对式(1)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列示于表4列(1)和列(2)。由表可见,*GTP* 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检验结果保持一致。

4. 剔除2016年及以后年度的样本

由于2016年全国所有地区均已实施金税三期工程,而基准检验中样本期间涵盖了2016年以后年份,可能使2016年后其他可能影响企业创新注意力的政策出台对本文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为缓解这一问题,借鉴刘慧龙等(2022)的做法,剔除2016年

表4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改变创新注意力衡量方法		删除2016年以后年度样本		排除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i>AdjAttent</i>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1)	(2)	(3)	(4)	(5)	(6)
<i>GTP</i>	0.012*** (2.711)	0.012** (2.001)	0.017*** (3.352)	0.016*** (4.094)	0.033*** (10.119)	0.042*** (6.78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971	6971	6615	6615	6971	6971
R ²	0.053	0.088	0.193	0.248	0.137	0.22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以后样本,重新对式(1)进行估计。表4列(3)和列(4)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结果显示,“金税三期”工程 *GTP* 的估计系数分别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依然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这说明基准估计结果并非由于2016年以后实施政策造成的。

5. 排除减税降费政策的影响

在本文样本期间内,国家实施了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而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可能通过减轻企业税收负担,缓解管理层生存忧虑,促进企业更多地将注意力配置到创新领域。借鉴张克中等(2020)的做法,在基准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企业实际税负(*ETR*),使用企业支付的各项税费与收到的税费返还之差除以营业收入的比值衡量。张克中等(2020)指出,减税政策的效果会在企业实际税负上得到反映,控制企业实际税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减税降费政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影响效应。控制企业实际税负(*ETR*)后的估计结果列示于表4列(5)和列(6)。由表可知,在控制实际税负(*ETR*)

后,“金税三期”工程 *GTP* 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正,与基准检验结果一致。

(四) 异质性检验

1. 行业和地区异质性

行业异质性方面,本文分别比较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传统行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影 响。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将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等6个行业划分为高新技术行业,并在此基础上对基准模型进行分组估计,估计结果列示于表5列(1)和列(2)。结果显示,*GTP* 估计系数在传统行业组中为0.116,而在高新技术行业组中为0.072,且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值为0.051)。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在传统行业组中相对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间的创新竞争相对激烈,在未实施“金税三期”工程前已经具有较高水平的创新注意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税收征管数字化

表5 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传统行业	高新技术行业	高市场化地区	低市场化地区
	(1)	(2)	(3)	(4)
<i>GTP</i>	0.116*** (6.983)	0.072*** (4.696)	0.020*** (2.734)	0.067*** (4.2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差异检验(P值)	0.051*		0.037**	
观测值	4392	2579	4617	2354
R ²	0.392	0.398	0.331	0.382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强化企业创新注意力的边际效应。

地区异质性方面,考虑到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企业在创新以及避税活动方面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影响税收政策数字化的政策效应。依据王小鲁等(2021)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使用分省份市场化指数衡量地区市场化水平,进而根据样本期市场化指数均值将样本企业区分为高市场化地区组与低市场化地区组,并在此基础上对基准模型进行分组估计,估计结果列示于表5列(3)和列(4)。结果显示,*GTP*估计系数在高市场化地区组中为0.020,而在低市场化地区组中为0.067。从这个角度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在低市场化地区组中更为明显。可能的原因是,在传统税收征管模式下,低市场化地区政府存在更多非市场化行为,“关系经济”现象相对更明显,企业避税动机和讨价还价行为相对更强。与高市场化地区相比,税收征管数字化在抑制企业避税动机,促进管理层注意力向创新活动转向方面的治

理作用在低市场化地区企业中相对更明显。

2. 企业异质性

企业异质性方面,本文主要从高管技术背景和融资约束两方面展开检验。首先,借鉴齐鲁光等(2021)的做法,依据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具有技术研发经历将样本企业区分为技术型高管组与非技术型高管组。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职业经历对其注意力配置具有重要的影响。分组估计结果列示于表6列(1)和列(2)。结果显示,*GTP*估计系数在技术型高管组中不显著,而在非技术性高管组中显著为正。这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在技术型高管任职企业中相对更明显。烙印理论和高管梯队理论认为,高管个人经历会显著影响其注意力配置,进而作用于企业行为决策。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实施抑制了管理层避税动机,促使管理层注意力资源配置结构的重置。与非技术型高管相比,具有技术研发任职经历的高管受烙印效应的驱动,更容易将注意力资源向创新

表 6 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的企业异质性

变量	被解释变量: <i>Attent</i>			
	技术型高管	非技术型高管	强融资约束	弱融资约束
	(1)	(2)	(3)	(4)
<i>GTP</i>	0.018 (0.667)	0.025*** (3.014)	0.042*** (2.903)	0.121*** (13.8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组间差异检验(P值)	0.003***		0.075*	
观测值	1183	5788	3626	3345
R ²	0.581	0.319	0.320	0.179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领域倾斜,从而使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创新注意力产生更强的正向关联。

在给定注意力资源下,融资约束伴随的生存忧虑会与创新注意力资源形成竞争,进而影响税收征管数字化的政策效应。借鉴鞠晓生等(2018)的做法,使用“金税三期”工程实施前样本企业SA指数中位值衡量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将企业区分为强融资约束组与弱融资约束组。分组估计结果列示于表6列(3)和列(4)。结果显示,*GTP*估计系数在强融资约束组中为0.042,而在弱融资约束组中为0.121,且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P值为0.075)。从这个角度看,与强融资约束企业相比,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在弱融资约束组中更为明显。税收征管数字化压缩了企业避税空间,短期内可能会强化企业税收负担,增加管理层生存忧虑,与企业创新注意力资源形成竞争,这种效应在强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强融资约束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强化效应。

(五)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前述理论分析,税收征管数字化主要通过压缩企业避税空间、缓解代理成本以及减少可支配现金流等影响企业创新注意力配置。为进一步检验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传导机制,借鉴Baron和Kenny(1986),采用分步回归法进行内在机制检验。在模型(1)基础上,构造如下模型展开检验:

$$Mediator_{i,t} = \beta_0 + \beta_1 GPT_{i,t} + \gamma Control + \tau_t + \lambda_j + \varepsilon_{i,t} \tag{2}$$

$$Attent_{i,t} = \beta_0 + \beta_1 GPT_{i,t} + \beta_2 Mediator_{i,t} + \gamma Control + \tau_t + \lambda_j + \varepsilon_{i,t} \tag{3}$$

其中,*Mediator*表示中介变量,分别包括避税行为、代理成本与可支配现金流。借鉴蔡宏标和饶品贵等人的做法,使用“会计—税收差异”(Btd)对企业避税行为进行衡量,计算方法为:即(税前会计利润—应纳税所得税)/期初总资产。会计—税收差异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高。代理成本方面,本文选取管理费用率(*Agency*)即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的比值

进行衡量^[9],管理费用率越高,企业效率相对低下,代理成本可能越高。可支配现金流方面,使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Cfo*)衡量,比值越高,可支配现金流越充裕。

表7列(1)、列(3)和列(5)实证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地抑制了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代理成本,并对企业可支配现金流产生显著负面影响。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引入避税行为、代理成本和可支配现金流后,列(2)、列(4)和列(6)的结果显示,避税行为和代理成本对企业创新注意力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可支配现金流的提升则对企业创新注意力具有强化效应。如理论分析所述,避税行

为需要耗费高管较多精力进行税收条款研读以及交易设计等,进而对创新注意力形成一定的挤占。代理成本方面,当企业存在较强的委托代理问题,在自利动机驱使下管理层存在较强的短视行为,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提升具有负面效应。可支配现金流与企业生存风险存在密切关联,现金流越充裕,管理层生存忧虑越低,从而将更多注意力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中。三种路径的Sobel检验*p*值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避税行为、代理成本与可支配现金流均在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注意力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

表7 税收征管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注意力的作用路径检验

变量	<i>Btd</i>	<i>Attent</i>	<i>Agency</i>	<i>Attent</i>	<i>Cfo</i>	<i>Attent</i>
	(1)	(2)	(3)	(4)	(5)	(6)
<i>GTP</i>	-0.007** (-2.079)	0.024*** (3.810)	-0.029*** (-2.857)	0.022*** (3.665)	-0.043*** (-2.850)	0.089*** (16.418)
<i>Btd</i>	—	-0.131*** (-5.083)	—	—	—	—
<i>Agency</i>	—	—	—	-0.0096*** (-4.5168)	—	—
<i>Cfo</i>	—	—	—	—	—	0.017*** (3.60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Sobel	-5.445***		12.430***		-5.021***	
观测值	6971	6971	6971	6971	6971	6971
R ²	0.139	0.165	0.108	0.175	0.107	0.232

注: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显著性水平检验。

五、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在有限注意力约束下,提升企业创新注意力是

激励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抓手。本文以“金税三期”工程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探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税收征

管数字化显著地提升了企业创新注意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与高新技术行业企业、高市场化地区企业、非技术型高管任职企业以及强融资约束企业相比,这种影响在传统行业企业、低市场化地区企业、技术型高管任职企业以及弱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创新注意力的影响主要通过企业避税行为、代理成本和可支配现金流渠道传递。

本文的启示意义在于:第一,在有限注意力资源约束下,税收征管数字化通过压缩企业避税行为空间,缓解管理层代理问题,促使管理层将注意力资源更多地配置到创新领域,减少对避税等非生产性活动的关注,有助于优化注意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因此,政府在政策法规设计方面,注重强化对企业非生产性活动的遏制,充分发挥政策法规在注意力方面的纠偏效应,引导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实业领域高质量发展。第二,在税收征管数字化推进过程中,应注重政策推进力度和节奏。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短期内显著降低了企业可支配现金流,一定程度对创新注意力的提升产生了负面效应。大数据税收征管技术的应用显著地改变了企业税收征管环境,过快过强的提升税收征管力度短期内可能会加大企业生存压力,强化管理层生存忧虑,一定程度上对创新注意力形成挤出。因此,应提高税收征管数字化推进的透明度,加强政策宣传,促使企业形成合理预期,促使企业更好更快地适应税收征管环境的改变。第三,企业层面,尽管避税等非生产性活动能够在短期内减少企业成本支出,对财务业绩的提升

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类活动受外部监管制度政策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和短期性。完善公司治理架构,遏制管理层短视倾向,促使管理层注意力向创新领域转移,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是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以及价值创造的必由之举。

参考文献:

- [1] 吴建祖,曾宪聚,赵迎. 高层管理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创新战略——两职合一和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J]. 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6(5):170-180.
- [2] 陈守明,唐滨琪. 高管认知与企业创新投入: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J]. 科学学研究,2012(11):1723-1734.
- [3] 宋广蕊,马春爱,肖榕. 同群效应视角下高管创新注意力、连锁关系对企业创新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2(8):1195-1203.
- [4] 解学梅,韩宇航. 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2022(3):76-106.
- [5] 蔡伟贤,李炳财. 税收征管、税收压力与企业社保遵从[J]. 世界经济,2021(12):201-224.
- [6] 李增福,骆展聪,杜玲,等.“信息机制”还是“成本机制”?——大数据税收征管何以提高了企业盈余质量[J]. 会计研究,2021(7):56-68.
- [7] Xiao C. R., Shao Y. C.. Information system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enforce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2020,39 (6):No.106772.
- [8] 李艳,杨婉昕,陈斌开. 税收征管、税负水平与税负公平[J]. 中国工业经济,2020(11):24-41.
- [9] 蔡昌,林高怡,王卉乔. 税收征管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分析[J]. 会计研究,2021(5):107-120.

- [10] 徐捍军. 大数据税收征管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吗? ——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21(2):93-107.
- [11] 刘慧龙, 张玲玲, 谢婧. 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企业关联交易治理[J]. 管理世界, 2022(6):158-176.
- [12] 李增福, 朱进. “金税三期”税收征管对上市公司审计费用的影响[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2(1):105-118.
- [13] 张克中, 欧阳洁, 李文健. 缘何“减税难降负”: 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J]. 经济研究, 2020(3):116-132.
- [14] 吴建祖, 关斌. 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 软科学, 2013, 27(11):76-80.
- [15] 董临萍, 宋渊洋. 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国际化绩效: 权力与管理自由度的调节作用[J]. 管理评论, 2017(8):167-178.
- [16] Zheng X., Liu Z., Gong X.. Why does leader attention scope matter for innovation ambidexter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J]. Leadership &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Journal, 2016, 37(7):912-935.
- [17] Simon H. A.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 [M]. New York: Macmillan, 1947.
- [18] Levy O. The Influence of Top Management Team Attention Patterns on Global Strategic Posture of Firm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05, 26(7):797-819.
- [19] 吴建祖, 赵迎. 高层管理团队注意力对企业多元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9):107-113.
- [20] Yadav M.S., Prabhu J.C., Chandy R.K. Managing the future: CEO attention and innovation outcomes[J]. Journal of marketing, 2007, 71(4):84-101.
- [21] Eggers J.P., Kaplan S. Cognition and renewal: comparing CEO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s on incumbent adaptation to technical change[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9, 20(2):461-477.
- [22] 汪涛, 于雪, 崔楠.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企业内部研发与合作创新交互效应研究——财务松弛和信息技术的调节作用[J]. 研究与发展管理, 2020(1):1-12.
- [23] 孙雪娇, 翟淑萍, 于苏. 大数据税收征管如何影响企业盈余管理? ——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 会计研究, 2021(1):67-81.
- [24] Balakrishnan K., Blouin J.L., Guay W.R.. Tax aggressiveness and corporate transparency[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9, 94(1):45-69.
- [25] Desai, M. A., and D. Dharmapala.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High-Powered Incentive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6, 79 (1):145-179.
- [26] 李哲. “多言寡行”的环境披露模式是否会被信息使用者摒弃[J]. 世界经济, 2018(12):167-188.
- [27] 王小鲁, 胡李鹏, 樊纲. 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 [28] 齐鲁光, 陈刚, 于明涛. 技术型核心高管、企业投资与期权价值[J]. 科研管理, 2021, 42(07):163-170.
- [29] 鞠晓生, 卢荻, 虞义华.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管理与企业创新可持续性[J]. 经济研究, 2013(1):4-16.
- [30]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 - 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1173-1182.
- [31] 蔡宏标, 饶品贵. 机构投资者、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J]. 会计研究, 2015(10):59-65.

【责任编辑 刘起翰】